

中国书画的海外传播研究

——以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齐白石作品为例

陈雅婧

(湖南科技大学 齐白石艺术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近百年来中国书画风靡全球,一方面它代表着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另一方面也是国家实力日益强盛的象征。在历代中国书画中齐白石作品已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硬通货”。以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收藏的齐白石作品为例,从藏品来源到馆方对其进行的一系列保存、修复、展览、研究、教育等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书画在海外传播的真实状态。

关键词:京都国立博物馆;齐白石;中国书画;海外传播;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1-0162-07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互动不断深入,中国书画作为东方古典艺术精髓的代表,深受海外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喜爱,他们竞相购买,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掠夺。其中以英、法、美、日、俄等国最为狂热,而日本作为唯一深受汉文化影响的东亚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书画的接受程度较其他国家更为深入和全面。

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1912年清朝覆亡后大量宫廷御物流向民间、散落海外,数量之大、品质之精,甚至超过历朝历代海外收藏的总和。此时日本京都大学汉学专家内藤湖南^①,不忍望见孕育千年的东方文明流离失所,大力倡导日本政、商、学界人士集体收藏中国书画。他曾感慨:“中国在那样的状态下,贵重艺术品接二连三地流出或被毁,我们得设法将它们保存在同属东亚文化圈,并且从很久以前就有着深厚关系的日本才是。”^②这句话的背后固然有着文化投机心理(大部分中国艺术品在这个时期都价格低廉),但不可否认的是对身处水深火热

中的中国书画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于是涌现出像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山本悌二郎、黑川幸七、藤井善助、菊池惺堂、须磨弥吉郎、矢代幸雄等一批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大家。

在日本流转的中国书画除晚清以前的古代绘画外,近现代名家名作也颇受欢迎,其中尤以吴昌硕和齐白石二人最受瞩目。据中国学者陈振濂推断,吴昌硕所有传世品中40%以上在日本^③,而齐白石作品在日本的传播量也相当可观。从1922年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携齐白石《桃花坞》《横江扬舲》等9幅作品参加东京府举办的“第二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被抢购一空,到如今日本艺术品交易市场随处可见齐白石书画,齐白石在日本的知名度可谓经久不衰。21世纪初,很多曾归属日本私人或财团收藏的经典美术作品被不断公众化,这是国家调控文化艺术普世价值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艺术品最大潜力的有效途径。例如曾聚集在私人手中的齐白石作品,如今就有很大一部分被藏家本人或家属主动捐赠给了公共博物馆,

收稿日期:2021-10-27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YBQ051)

作者简介:陈雅婧(1988—),女,湖南湘潭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日近现代美术交流研究。

①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近代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

②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中国书画在日本:关西百年鉴藏记录》,苏玲怡等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陈振濂:《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而博物馆又会将这些作品作为重要的国际艺术资源服务于大众。

1951年日本制定的《博物馆法》中明确规定了博物馆运营的四大使命,即“博物馆资料的收集、保存、研究和教育”。本文以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以下简称京博馆)藏齐白石作品为切入点,围绕中国书画在海外的传播状态,试图揭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人艺术的国际接受情况。

一 私人捐赠为主的藏品来源

目前京博馆内共收藏有42件齐白石作品,其中包括须磨弥吉郎(1892—1970年)旧藏33件,京都龙门社创始人、书法家森冈峻山(1902—1991年)旧藏9件。须磨藏品中有10件山水、1件人物和22件花鸟杂画;森冈藏品9件均为齐白石的大写意花鸟。

须磨弥吉郎出生于日本秋田县,小时候在外祖父古仲清廉的教导下研习中国书画,长大后自号昇龙山人,把位于东京荻洼的书房取名“梅花草堂”,1927年11月至1937年1月在中国担任外交官。须磨在中国期间极尽所能地收集中国近代画家,如齐白石、姚茫父、张大千、徐悲鸿、高剑父、王祺等人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经须磨之手的中国书画就达上千件,大部分被记录在其《梅花草堂藏画目》中。目前京博馆中须磨旧藏齐白石书画虽只有33件(其中包括两套花鸟册页),但根据《梅花草堂藏画目》中《齐璜白石翁》的记载,以及1960年在东京白木屋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现代中国画坛巨匠——须磨弥吉郎藏齐白石作品展”配套画册的整理,曾属于须磨旧藏的齐白石书画多达150件以上^①。这个数目在全球齐白石书画私人收藏中也算是相当惊人的。除京博馆部分,其他作品仍保留在家属手中,有时也偶见在市场流通,比如2018年北京保利春拍,一套须磨藏齐白石山水册页(十册)以5630万人民币的高价成交,可见其品质在当代艺

术品交易市场上的接受和认可度。

须磨弥吉郎与齐白石相识于1928年4月19日燕京日本人俱乐部举办的齐白石个人画展,当时须磨买下了全场最贵的一幅山水《朝日松堂图》,以及唯一一件《篆书对联》(须磨笔记中称其为《汉隶对联》,实则为篆书对联)。事后齐白石还亲自问了须磨为什么当时不想买其他画种?须磨回答:“可能是因为这些作品(花鸟鱼虫类)太多了,不好分辨,所以只想静静地挑选山水。”^②因而在本就不多产且不被时人重视的齐白石山水画中须磨藏品的占比非常大^③。须磨在1928年至1933年于北京任职期间亲自登门拜访过齐白石至少5次,且每一次都有作品收入^④。1954年须磨弥吉郎受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又去拜访了齐白石,没想到九十多岁的白石翁还认识须磨,知道他喜欢自己的山水,就送给他一幅《水连天图》^⑤。

须磨弥吉郎是昭和时代日本推广齐白石艺术的第一人,曾于1953年在东京艺术大学、1955年在东京大学博物馆、1960年在东京白木屋及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图1)举办过四次个人收藏的齐白石画展,并出版有多本画册。1955年《三彩》杂志刊登了一篇须磨介绍齐白石的文章:

“(齐白石)是自我创造的画家。当然多少也受到中国画史上发光发热人物的影响,但独创性更多。我认为外界将其比喻为‘东方的塞尚’是恰如其分的,他主观的感性笔触几可与欧洲印象派后期作品比拟啊。”^⑥

须磨弥吉郎书画旧藏留下了丰富的文字记载,也记录了他作为藏家与画家建立的深厚私人情谊,另一位藏家森冈峻山在他的捐赠藏品中却没有留下太多周边信息。不过他个人的藏品结构却代表着近现代日本另一部分藏家对齐白石书画的态度。

①《京都国立博物馆须磨收藏图版目录:中国近代绘画1——齐白石》,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77—90页。

②须磨弥吉郎:《齐璜白石翁》,载西上实:《资料介绍:须磨笔记中国近代绘画编1》(《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25号),2003年5月,第89页。

③齐白石自己说:“余画山水绝无人称许,中年仅自画借山图数十纸而已,老年绝笔。”参见敖晋编:《齐白石谈艺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116页。

④须磨弥吉郎:《齐璜白石翁》,载西上实:《资料介绍:须磨笔记中国近代绘画编1》,《京都国立博物馆学丛》第25号,2003年5月,第90—99页。

⑤须磨弥吉郎:《中共见闻记》,东京产业经济新闻社1955年版,第78—80页。

⑥须磨弥吉郎:《齐白石》,《三彩》1955年11月。



图1 须磨弥吉郎1960年在齐白石画展中与朋友交谈,身后是他收藏的齐白石《红白菊花烂漫图》

森冈峻山是日本现代书法家、京都龙门社创始人,能写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他在研习书法的同时,一直对中国书画抱有很深的敬意,常常是一边创作一边收藏。在森冈峻山的中国近代书画藏品中占绝对主流的是以吴昌硕为首的海派名家,他认为中国水墨画的精髓在于“书画同源”,而吴昌硕以金石入画的方式很好地体现了文人艺术笔墨意趣的最高成就。他对齐白石作品的收藏,同赵之谦、蒲华、王一堂等人的作品一样,是作为吴氏金石大写意风格传承脉络的补充。森冈峻山的书法家从于井上西山,井上是与吴昌硕交好的山本竟山的弟子,森冈后来也直接师从于山本竟山,山本竟山的老师日下部鸣鹤更是与吴昌硕来往密切,那么森冈自然对吴昌硕有着非同一般的情感^①。在后世研究者们看来,齐白石于“衰年变法”初期确实曾借鉴过吴昌硕金石画风的大写意手法,不过随即又加入了更多民间审美和自我创新,但这种“创新”在某些正统艺术捍卫者眼里却是对传统的“离经叛道”,例如与森冈有着同样从艺背景的日本谦慎书道会会长青山杉雨(1912—1993年),曾在20世纪60年代时评价齐白石:

“概览齐白石所做之事,可见其有违传统中国美术常识的部分,让人痛心,

这是多么粗野、毫无洗练的东西啊。齐白石与据传受其影响甚多的吴昌硕一比,形式上或有共通之处,但内容却大不相同。”^②。

1991年森冈峻山在弥留之际向京博馆捐赠了115件中国书画,其中吴昌硕作品52件,齐白石作品9件,分别是《枇杷图》《藤花图》《雏鸡图》《虾蟹图》等,均为白石翁成名后重复率极高的绘画题材,且大多都没有年款。这说明森冈峻山对齐白石的了解只停留在大众流行的印象中,并没有像须磨弥吉郎那样有深入研究的意愿和个人独特的收藏心得。但是像森冈峻山、青山杉雨这样的中国正统文人书画的崇拜者,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对齐白石的艺术评价又有了很大的改观。青山杉雨说道:

“三十年前的我对于齐白石的认识极为肤浅,令人羞耻不已。今日观之...再次检讨其作品内容,深刻了解到齐白石是本世纪的大作家。”^③

京博馆内的齐白石书画,基本源于私人藏家捐赠,其数量有多有少。从中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须磨藏品的独特性,因此博物馆方及学艺员们在对馆藏齐白石作品进行研究整理和展览输出时,会着重偏向于选择须磨藏品,在确认藏品为真迹的前提下,维持馆内日常运营较高的学术水准。

二 中日合作式保存与修复

博物馆藏品是国家的文化财产,也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是博物馆开展业务活动的物质基础。藏品的保存与修复是指博物馆为了防止自然或人为因素导致的流失和损坏,而对藏品进行的存放、保管、修理、装裱等工作^④。博物馆对藏品的保存与修复是其日常运营当中的基础环节。

京博馆在建馆之初就对藏品有着非常严密的保存修复制度,并按照艺术品的不同类别有针对性地进行精细化管理。像中国书画类的艺术品,就以原封卷轴套布袋的形式按题材和编号放置于多层木质棚架上。藏品入库前列品保管员会对其进行登记和整理,并及时将信息上传至博物馆官

①吴孟晋:《须磨收藏与森冈收藏——京都国立博物馆藏齐白石作品》,王怡文译,载《典藏古美术》(中国台湾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314期。

②青山杉雨:《齐白石的书·画·印》,《近代书法图表》1965年5月。

③青山杉雨:《齐白石的书·画·印(二)》,《近代书法图表》1992年4月。

④刘超英,崔学谱:《博物馆工作规范》,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网的藏品数据库。与之相关的公开信息有作品名称、等级、作者、国籍、时代、种类、形式、材料、尺寸、寄赠者、题跋、印章、内部编号、解说文字等(图2)。京博馆中的42件齐白石作品均被标记为A(书画)甲(品相最高等级)类,编号则按入库时间排序。除了官网上公开的简单信息外,每件书画藏品还有更多的附属资料被保存在库房,如鉴定书、购藏及寄赠评估价、接收日期、入藏日期、作品经历、摄影照片、著作权相关事项、作品状态记录、损伤位置图示、检查记录、保险更新的情况等。如须磨家族捐赠的齐白石《宋法大山水》,除原作外还保存有须磨的收藏笔记、齐白石壬戌年日记、齐白石为曹锟画的其他山水画、荣宝斋交易记录、画展图录等相关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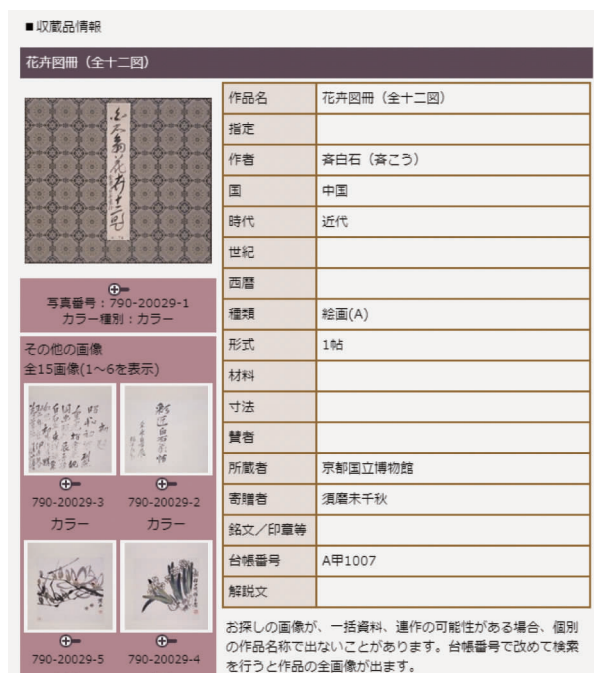


图2 京都国立博物馆 齐白石《花卉图册》保存信息

针对馆藏中国书画的修复,京博馆在1950年左右就成立了专门的国宝修理所,1980年7月正式更名为文化财保存修理所。但随着库存书画的不断扩充,附属文化财保存修理所的承载能力有限,馆方决定将明清以后的中国书画修复事宜转包给日本的“国宝修理装潢师联盟”单位。其中专门负责齐白石书画修复的是位于京都不远的大阪汉和堂。汉和堂创办者是中国书画修复大师陆宗润先生,他曾先后师从扬州派修复名师徐茂康、苏州派修复名师窦治荣,并于1972至1988年在上海博物馆从事书画修复工作。1989年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学习了八年东洋装裱,1998年在大阪建

立了自己的书画修复工作室“汉和堂”,旨在秉承中国传统修复技术的同时融会日本的装裱形式,特取“汉”“和”二字谨示集结彼此之长的心意。汉和堂几乎经手了所有2001年至今京博馆内所有需要修复的齐白石作品,如《宋法大山水》《耳食图》《花卉图册》等。陆宗润一直主张科学修复,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尽量让作品保存得更长久,比如他会将齐白石《耳食图》画面中卷翘褶皱的部分抚平,却并不会让这些痕迹消失,当今人再次观看时自然会联想到时间对艺术品的沉淀。

京博馆对齐白石作品的保存与修复主要建立在馆方提供的精良物质基础上,引入中国传统书画修复技术,以中日合作的方式共同为中国艺术精品的存续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博物馆还专门成立了“文化财保存基金会”,通过国家“公益事业税收优惠政策”及“非营利机构市场营销策略”向全世界公开募集捐款,并在实体店和网店售卖自己的文创衍生品,之后将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藏品的保存修复事业。这样一来,博物馆既可以保证藏品在当下的良好状态,又能为未来的时间延续夯实物质基础,无论藏品曾经的归属地在哪儿,都会在保存人类文明辉煌艺术成果的行动中,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重。

三 文化认同理念下的藏品研究、展览与公教推广

博物馆开展的各类学术研究、展览输出、公教活动等都属于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在日本,“终生学习”是贯穿每位公民一生的教育理念,政府也会积极为公民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比如博物馆、美术馆便是普通民众接受文化艺术教育最直接、最高效的平台。因此,博物馆自身的藏品结构直接影响着大众文化关系网的接受。目前日本最权威的四大国立博物馆(东京、京都、奈良、九州)中,中国艺术品占比非常之大,除了因为近代全球艺术品贸易的兴起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传统文化多源自中国,其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早已根植于数代人的记忆中,这种文化同宗使得齐白石艺术在日本的流播顺利且收获了广泛的赞誉。

自京博馆收到须磨、森冈家族捐赠的中国近代书画后就开始了持续不断的研究推广工作,特别是针对齐白石作品,从展览、出版到专题讲座、公教活动等屡见不鲜。馆内有两位学艺员专事齐

白石作品研究:一位是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的中国美术史专家西上实(现已退休),其研究成果有《齐白石山水画草稿》《齐白石〈宋法大山水〉赏析》等;另一位是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吴孟晋博士,曾发表过《向上看的鹰——从齐白石画鹰谈起》《东方塞尚——须磨弥吉郎眼中的齐白石》等论文。两位学艺员都对中国书画的海外收藏与运营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图3 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平成知新馆2F-5展厅“须磨弥吉郎藏齐白石作品展”现场

2014年京博馆新建平成知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整个二层全部是绘画厅,2F-5区域是专门的中国绘画展区,齐白石作品经常出现在此地(图3)。2018—2019年京博馆举办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国近代绘画巨匠——齐白石”大型特别展吸引了全球的中国艺术爱好者。馆方将与展览有关的齐白石研究发表在博物馆馆刊《学丛》上,且专门出版了一本《京都国立博物馆须磨收藏图版目录:中国近代绘画1 齐白石》。2019年2月,馆内相继举办了三场学术讲座,分别是西上实主讲的“须磨收藏的中国近代绘画”、吕晓(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主任)主讲的“从木匠到巨匠:齐白石的艺术与人生”、吴孟晋主讲的“齐白石绘画中的现代性”,讲座实行预约制,每场都座无虚席。博物馆官网列出了所有展品的详细资料,并制作了精美的导览手册和宣传海报,除了日文版外还有中文版和英文版。展览期间宣传海报基本覆盖了京博馆周边3公里以内的重要公共场所,包括公交车站、地铁站、文化场馆、学校、神社、大型商场,甚至路边的咖啡馆和花店门口(图4)。同期博物馆影像放映室循环播放《齐白石的作品与生涯》宣传片(约10分钟,中文字幕日语解说),以丰富齐白石作品视觉图像的传播路径。在博物馆商店上新了与展览相关的文创周边,有文具袋、包袋、冰箱贴、文件夹等,用文化消费的形式增加展览活动的社会关注度。



图4 京博馆附近商店门口的齐白石展海报

京博馆自建馆以来就以保存珍贵有形文化产品为大众进行知识服务为宗旨,因此纷繁多样的公共教育活动是其一大特色。每有大型特别展时,馆内的公共教育部都会事先制作好一套完整的活动方案,包括活动教育材料的选择和教育材料的程序化。教育材料的选择一般是由馆内学艺员指定,“中国近代绘画巨匠——齐白石”大型特别展的公教学习资料便是由学艺员吴孟晋指定,挑选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借山图》《坐佛图》《清平福来图》等作为观众学习的重要知识来源。教育材料的程序化又包括探讨形式和实施详情,也就是要举办什么样的“活动”。馆内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艺术品释读、观察及手工体验,也有针对大学生、青少年和儿童的趣味互动。特别是在儿童教育方面,实施方案设计得很用心,比如会将齐白石《宋法大山水》制作成线描母本(图5),让孩子们临摹和涂鸦,甚至专门编印了《儿童博物馆辞典》,里面的作品解析,全部日本汉字都被标注有平假名,句式简单,颇富童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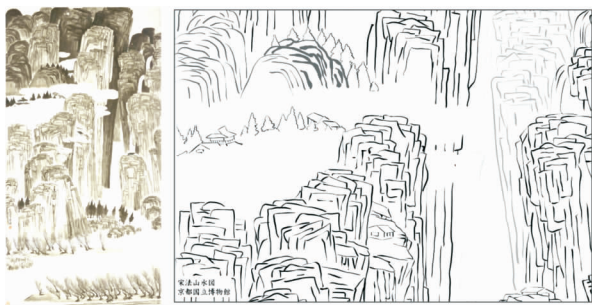


图5 齐白石《宋法大山水》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左)《宋法大山水》局部线描(右)

事实上作为知识生产的研究、展览与公教活动,都是博物馆与其使用者们进行对话的一种方式^①,也是博物馆将馆藏资源转换成文本图像进行教育再普及的重要步骤。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愈演愈烈,从21世纪初开始,日本博物馆自办或引进了大量的国际艺术展,以丰富本国居民的文化生活。“中国书画”便是在这样的契机下进入日本博物馆的研究、展览及公教活动视野中,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被日本及全世界所接受,甚至熟知。2011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了要在五年内实现“文化艺术立国”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年文部科学省文化厅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海外艺术品公开促进法》^②,在确保国际文物归属权的前提下,积极策划艺术品的交流展示活动。齐白石作为荣获“国际和平奖”及“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师,在世界早已享有很高的声誉,再加上他的绘画融传统文人、民间智趣、现代审美于一体,是新时期最能代表社会主义中国同世界人民对话的本土艺术家。因此京博馆选择从齐白石入手,开展一系列中国书画知识的传播,在认同并提炼传统汉文化精髓的同时,保证了博物馆教育普及活动的高参与度与高学术性。

四 中国书画海外传播的文化价值

自晚清民国以来中华大地逐渐步入现代社会,封建王朝的瓦解让原来隶属于精英文化圈的书画艺术开始大量流入民间、走向世界。随着文物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与近代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品被世人关注。然而近代中国国力衰微,帝国主义列强不但于政治、经济、军事领域对中国实行打压,在文化艺术上也开始疯狂掠夺,即便很多外国商人是通过正常的购买途径,也因乱世困顿,大部分艺术真品的价格远低于其价值。我们对这种被动的文化传播持抵制态度,为了让本民族文化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有识之士们还是做出了各方主动的努力。例如20世纪初我们引入了西方现代展览会制度,将传统书画以公开展示的方式传播,不但在国内举

办,还积极寻求在海外举办的机会。1920年代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六次联合绘画展览,齐白石就是在1922年东京举办的“第二次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中一举成名^③;1924年留法学生林风眠、林文铮等人一起在巴黎斯特拉斯堡举办了“中国美术专题展”;1933年徐悲鸿组织策划了在巴黎柔德堡美术馆举行的中国艺术展;1934年刘海粟在德国柏林普鲁士美术学院推出了中国现代绘画展;1935年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国际艺术展影响最大,国民政府从故宫博物院挑出735件传统书画让欧洲人民大开眼界,美国学者孔华润说:“这次展览极大地刺激了外界对中国艺术的研究兴趣,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于中国艺术的态度,也使他们对艺术的关注从欣赏走向学术研究的层面。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这是一次几乎不可想象的公关胜利。”^④之后中国艺术尤其是书画类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不论是私人藏家还是公众博物馆都对其青睐有加,频频出现拍卖天价和高品质展览。如今中国书画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均有收藏,它们在海外的传播也为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贡献了莫大的力量。

首先,中国书画的海外传播有利于对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现代国家只要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引进外来艺术资源,既可以为本国民众呈现世界文明的丰富多彩,也可以为人类文明的长久保存贡献力量。那些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辉煌印迹的艺术珍品,虽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原来的文化生态环境,但只要其一直保持物质形态的完整,不论辗转于何处,依然能散发出文明传播的曙光,甚至成为不同地区和平友好的纽带。

其次,可以取长补短,促进传统民族艺术在未来的良性发展。对艺术品原生国家而言,海外传播能将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精神智慧和物质载体与世界人民对话,并于交流和碰撞中获得新的灵感,从而在保存民族艺术之魂的前提下适应新时代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生产。对艺术品输入国而言,在不同程度上汲取其他国家的文化精华,不仅能丰富本国民众的文化资源,同时还能拓宽本土艺术发展的途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于东

①提姆·按鲁斯:《新博物馆管理创办和管理博物馆的新视野》,桂雅文译,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81页。

②参见《海外美术品公开促进法(平成23年法律第15号)》,《海外美术品公开促进法律施行令(平成23年政令第288号)》,《海外美术品公开促进法律施行规则(平成23年文部科学省令第33号)》。

③陆伟荣:《齐白石与近代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东方艺术》2013年第16期。

④孔华润:《东亚艺术与美国文化》,段勇译,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京举办的“走向盛唐——中国美术的十字路展”开幕式中提出:中国文明对日本影响深远,日本文化能呈现现在的状态与中国密不可分。他还号召人们珍惜长久以来的中日关系,并继续向中国学习,共同开拓亚洲的未来^①。归根结底,齐白石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因为他的笔墨技法有多么高深,而是他画中所透露出的“自然”与“生命”、“质朴”与“天真”正契合了日本人对艺术精神最本源的追求,不论时代如何变换,人类探寻真理的恒心和对美好事物的孜孜求索总是亘古不变的。

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书画的海外传播对中国国家文化品牌的树立及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央政府已深刻意识到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意义,推出了一系列“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战略,这使得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迅速拓展。其中中国书画所表达出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审美倾向已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作为国家对外传播的文化名片,中国书画所传递出的正能

量,正是全人类努力追求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而在某些喜爱中国书画的日本藏家及博物馆看来,中国书画并不是像西方油画那样在科学实证主义思想下对自然的再现,而是以哲学感悟的形式将心中的自然予以主观表达,这正契合了日式禅宗思想。因此中国书画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蕴,同时也具有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功能特性。如今中国书画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有固定心理认知的国家文化品牌。齐白石作为一名从湖南湘潭走出的中国书画大师,1955年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国际和平奖”,如今作品又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广受欢迎,价格屡创新高,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文化象征。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在近几年推出的馆藏齐白石作品展等,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的确立以及软实力竞争水平的逐步提升。而如何利用好自身文化积淀,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下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

On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 Case Study of Qi Baishi's Works in Kyoto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

CHEN Ya-jing

(School of Qi Baishi Art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10, China)

Abstract: For the past century,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has enjoyed popularity all over the world. On the one hand, it represents the supreme state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n human civi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symbolizes that China is now increasingly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Throughout the ages, Qi Baishi's works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have been recognized as “hard currenc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king Qi Baishi's works collected in the Kyoto National Museum, Japan, China's neighbouring count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genuine statu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overseas dissemination from the source of collections to a number of activities of the museum, such as preservation, restoration, exhibi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Key words: Kyoto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 Qi Baishi;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overseas dissemina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单霁翔:《博物馆使命与文化交流合作创新》,《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